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1.018

桐城诗派传衍湖南考论

吴大平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桐城诗派传衍湖南分为三个时期:一是道光中叶至咸丰初年。湖南士人在都下问法于梅曾亮,由此开始了接受和传衍。二是咸丰初年至同治末年。湘籍诗人回乡传法,在交游中推进了群体认同。与此同时,曾国藩接过桐城文柄,高位主持诗教。三是光绪初年至民国。湖南士人通过书院教育等方式推动薪火赓续。湖南桐城诗人极大地拓展了桐城堂庑,促进了桐城诗派中兴。传衍湖南是桐城诗派流行全国的重要环节,也是湖南地方文学史上关键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桐城诗派;传衍;湖南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1-0146-09

湖南士人阎镇珩曾经这样描述过湖南自嘉道以来的文学:“嘉道之际,楚才繁兴”^①。而吴敏树也说:“近时,吾楚中独多诗人。仅吾湖湘间专门擅声者,略可以十指数,其与吴越何异。”^②认为这是继茶陵李东阳以来,湖湘间诗歌创作最为繁荣的时代。湖南文学再度辉煌的历程正是桐城诗派在湖南传衍的过程。

道光末造,湖南桐城诗派开始崛起。并在咸同年间,逐渐壮大,成为桐城中兴的主要力量。而后一直绵延至民国,直至桐城诗派在新文学变革的冲击下走向衰落。应该说,这既是一段湖南地方文学史,也是一段桐城诗派传衍史。这一段文学史的建构,不仅揭示了桐城诗派流衍全国的诸多信息,也彰显了湖南诗学在邦国变局下经时济变的文化品性。考察这一段文学史,考虑到诗派传衍和创作活动的阶段特点,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 都下问法,衍其绪论

道光十五年(1835)至三十年(1850)前后,湖

南诗人通过梅曾亮开始接受桐城诗法,而且在京城开始了诗文唱和,并逐渐形成了湖南桐城诗派诗古文交游圈。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杨彝珍、吴敏树、孙鼎臣、周寿昌、舒焘等。

(一)友教京师

在管同逝后,“梅曾亮最为大师”^③,继乃师姚鼐之后宗主桐城。“天下之士始从姚先生者,莫不惟先生是归。”^④道光元年(1821)至道光二年(1822)、道光十二年(1832)至道光三十年(1850),梅曾亮两次入都。其在京居户部郎中闲职,得以闭门读书,研习诗文。同时延揽同道,揄扬后进,宣扬桐城义法。在桐城义法的感召下,都下士人纷纷追随梅氏学习诗古语法,以继桐城之学。

武陵杨彝珍作为最早一批入都问学的湖南诗人,是桐城诗派传衍湖南的典型。杨彝珍于道光十八年(1838)入都赴考,屡试不售。在几次进京赶考时,杨彝珍就教于梅曾亮。门人阎镇珩在其墓表中记述了其在都下问法于梅氏的情况:“初在都与梅郎中曾亮考论桐城姚氏宗法,其后大涵

收稿日期:2021-08-2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8BZW101);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重点项目(CX20200558)

作者简介:吴大平(1988—),男,湖南平江人,博士生,主要从事明清文学、古代诗学研究。

①阎镇珩:《祭移芝叟文》,见《北岳遗书》卷十,民国铅印本。

②吴敏树:《孙芝房侍读苍菴集诗序》,见《梓湖文录》卷三,清同治八年刻本。

③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426页。

④李崇元:《清代古文述传》,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56页。

蓄于百氏之旨,所得深微奥博,靡有堤涯。”^①这一交往问学的经历,成为了杨氏明确为学薪向的重要环节。在其后来的回忆中,也深受珍视:“有集留天壤,名自难湮落。不堪重追忆,共饮京华春。”^②杨彝珍老寿康强,曾重宴鹿鸣,为湖南晚清诗人中最为高寿者,行迹横跨嘉道咸同光五朝。与后来的湖南桐城诗人几乎都有交游,深受晚清湖南士人尊敬。杨氏的声望及其明确的尊崇与导引,在后来湖南士林归附桐城风气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巴陵吴敏树与桐城派的关系虽是争论不休的公案,但他在桐城诗派传衍湖南中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道光二十四年(1844),吴敏树携带自己所钞归有光文入都,深受都下士人欢迎,由此结识梅曾亮,并受其奖掖。吴敏树《记钞本归震川文后》:“余既钞归震川之文而序之,后三年甲辰,携之京师,同年友武陵杨彝珍性农从余借去。阅数日,瑞安项孝廉传霖来访余。盖从性农所见此书……因为余言京师名能古文者,有江南梅郎中其人也。”^③又,《与梅伯言先生书》:“在都,于项君几山所,得见先生,既乃因缘进谒,遂蒙赐示大著文集。……于是乃知天下文章,固在于先生。……随又得接待一二次,备闻指论。”^④道光二十四年(1844),吴敏树通过杨彝珍认识了项传霖、梅曾亮等人。梅曾亮极力推扬吴敏树的文学创作成就,使其名盛于京师。善化孙鼎臣的描述也正好印证了这一事实:“阁下之文,梅伯言郎中所推。”^⑤其实,吴敏树对梅曾亮的文学成就也极其敬仰。他多次在其诗作中表现对梅曾亮的服膺。如:“昔我知伯言,京师作合朋。”^⑥“君徒诗似茶陵相,我自文惭柏枧翁。”^⑦“宣城梅叟老文理,吾乡曾子近奇崛。”^⑧在与梅曾亮的交往中,吴敏树酬

唱赠答,抄读梅作,深受桐城诗法影响。

善化孙鼎臣在《与梅先生书》写道:“少习诗歌、骈俪之文……来京师,见先生之文,与闻其议论……心好之,未敢言也。”^⑨又,派中之人邵懿辰在《孙芝房墓志铭》中说:“梅郎中用文术友教京师,月一再会,谈诗古语法,凡书册所有与今时事得失相发者,余与君及曾侍郎先后间往与其会饮食游,处近十年,相与极欢。”^⑩孙鼎臣还写诗回忆当年与梅曾亮论诗问法的场面:“忆同梅叟论文日,衣冠道泰无兵革。”^⑪

长沙周寿昌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京参加恩科,是这一批进京的湖南士人中仕途较为通达的。虽较晚入都,但也曾问法于梅曾亮。门人江阴缪祐孙曾这样回忆乃师从梅氏问学情况:“朴学浮溪亲授受,名篇柏枧示周行。”^⑫

溆浦舒焘还曾执弟子礼问法于梅曾亮。梅曾亮为其别集作序,并称述其问学之诚:“伯鲁始以年家子见余于京师,呈诗文为贄。……及复应顺天试,与弟子仲和馆余家,其诗文则大变矣。且执弟子礼甚恭,录示诗一通以去。后余主讲梅花书院,复来扬州,录续所为诗文以去。”^⑬舒焘师事梅曾亮,受其点拨,而诗文大变,有所成就,有“溆浦三杰”之称。但天不假年,未至三十而卒,未尽弘扬师道之功。舒焘的师从及其文学成就,在湖南诗人间是被广泛知晓和肯定的。吴敏树就曾这样写道:“结交诸老问,梅叟独师绪。”^⑭在与梅曾亮的交游中,完成师徒定交,有着更特别的意味。它既是湖南士人在都下宗法桐城、崇扬梅氏心态的集中体现,同时也对之后士人回湘传衍桐城诗派重视师承统绪有着一定的影响。以梅曾亮为核心的京城文学交游圈是推进桐城诗派传衍湖南的关键。湖南文人正是在京城的交游中,服膺桐城梅

① 阎镇珩:《外舅移芝先生墓表》,见《北岳遗书》卷十二,民国铅印本。

② 杨彝珍:《梅民部曾亮》,见《移芝室全集·诗集》卷一,清光绪二十二年孙世猷刻本。

③ 吴敏树:《记钞本震川文后》,见《梓湖文集》卷五,清光绪十九年思贤讲舍刻本。

④ 吴敏树:《与梅伯言先生书》,见《梓湖文集》卷七,清光绪十九年思贤讲舍刻本。

⑤ 孙鼎臣:《复吴南屏书》,见《苍莩文初集》卷十三,清咸丰刻本。

⑥ 吴敏树:《为邓守之待召题其尊人完白先生石交图》,见《梓湖诗录》卷二,清同治八年刻本。

⑦ 吴敏树:《芝房旧赠诗联书后》,见《梓湖诗录》卷四,清同治八年刻本。

⑧ 吴敏树:《赠邵位西员外即题其诗集兼索所著古文》,见《梓湖诗录》卷二,清同治八年刻本。

⑨ 孙鼎臣:《与梅先生书》,见《苍莩文初集》卷十二,清咸丰刻本。

⑩ 邵懿辰:《苍莩诗初集序》,见《苍莩诗初集》卷首,清咸丰刻本。

⑪ 孙鼎臣:《送吴南屏广文还巴陵》,见《苍莩诗初集》卷七,清咸丰刻本。

⑫ 缪祐孙:《周自庵师七十生辰献诗四首次韵陶心云韵》,见缪荃孙辑《旧德集》卷十,清光绪二十四年刻本。

⑬ 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彭国忠、胡晓明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371页。

⑭ 吴敏树:《哭舒伯鲁郎中五十韵》,见《梓湖诗录》卷一,清同治八年刻本。

氏,学习桐城诗法,完成了对桐城诗派的接受。

(二)京华雅集

在都的湖南诗人除了问法于梅曾亮之外,还逐渐开始了都下雅集唱和的活动。这样的创作交流活动,一直延续,并成为诗派传衍的重要方式。参与雅集的湖南诗人们正是在这样的“异同互见”中,互相切磋砥砺,完成了桐城诗法的交流与接受。

李元度在《与孙琴西方伯书》中深情回忆了那时都下湖南士子雅集唱和的情形:“曩者庚戌辛亥壬子间,元度旅食京师。间从曾文正、邵位西、孙芝房、吴南屏、杨性农诸公游。时执事与性丈同选馆职。诸君子相唱和。元度获窃闻绪论,心向往之。”^①

周礼昌在周寿昌的行状中也有相似的描述:“而一时人杰如曾文正公、毛文达公……咸在京邸,以文章道义相砥砺。”^②周寿昌还与孙鼎臣交好,诗文志趣相近。门人王先谦在汇辑周寿昌、孙鼎臣等人的《诗余偶钞六家》时复述周寿昌之言,描述了他们的文字之交:“道咸间,与孙芝房侍读、李舜卿孝廉诸人为文字饮,每舜卿一词出,芝房及余皆敛手叹服。”^③宗法桐城,在都下的湖南诗人间已成风气。而曾国藩在收到杨彝珍的“篋郇唱和”的和作时,也致信回忆其在都雅集谈艺的情况:“回忆昔年供职春明,时与二三朋好把臂论文,飞觞谈艺,异同互见,兴往情来。”^④

这些关于都下雅集的记述生动地展现了湖南士子求其友声的现实情形,也是湖南经世派士人因志趣相投而聚集的早期形态。这种交往不仅为湖南理学经世群体乃至湘军集团的形成壮大奠定了基础,也为推进桐城诗派传衍湖南提供了历史契机。这一交往形式和同道之谊更是在湖南士人出都之后得到了延续和拓展,文学的集聚效应在这样的群体交往中被逐渐激发。

道光三十年(1850)秋,梅曾亮辞官出都。道光二十五年(1844)吴敏树回乡守制。咸丰二年(1852),杨彝珍乞假回乡,倡办团练。同年,孙鼎臣被擢为翰林院侍读,后不久就请假回湘,奉母读

书。咸丰三年(1853),周寿昌回籍丁忧。随着湘籍诗人的陆续离京,对桐城诗派的初步接受也即告结束。此时,面对邦国巨变,崇尚义理、标榜雅洁的桐城诗派应对无措,进入了短暂的衰落期。而在这些初步接受桐城诗法的湖南士人中,正在悄然孕育着一场诗学新变。

二 师友砥砺,张大桐城

从咸丰初年至同治末年,第一批湖南桐城诗派诗人开始了浩浩荡荡的湖南传衍活动。曾国藩及其幕府在这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逐渐接过了桐城文柄,以高位主持诗教。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诗人是曾国藩、李元度、刘蓉、曾纪泽等。

(一)回湘授徒

咸丰兵燹既起,清廷危亡,生民涂炭。在都闻法的湖南诗人们回湘后,弘扬湖南理学经世传统,担荷天下,经世济变。在辅世翼教的同时,更是设帐授徒,推动了桐城诗派在湖湘大地的传衍与生根。

杨彝珍回到湖南常德,在同治元年(1862)创办了移芝讲舍,在同治四年主讲郎江书院。杨彝珍在当地声望甚隆,许多年轻士子都跟随其学习诗文。比如阎镇珩、朱晴笙、刘凤苞等。阎镇珩少有才名,“当时耆宿,杨彝珍、郭嵩焘、孙衣言、王先谦诸先生莫不礼先而结交之”^⑤。同乡杨彝珍名重一时,阎镇珩便归于门下。阎镇珩不乐仕进,在杨氏门下专心学习。阎氏门人慈利吴恭亨说其诗文“宽厚雄博,直俪湘乡曾文正”^⑥。此时,逐渐形成了以曾国藩为中心的桐城诗派湖南传衍群体。面对这一背景,这种夸赞自然有其深刻的意蕴。不仅暗示了湖南文柄交替的历史现实,也充分说明了通过学习曾国藩进而趋附桐城的文苑风气。作为笃守师说的门徒,朱晴笙始终如一传扬师道的品质更是深受杨彝珍赞扬。《祭朱晴笙文》:“吾尝言主讲席四载,经吾陶淑而可逮于古作者惟生一人,其终始内外如一而不背负我者,亦惟生一人。”^⑦

①李元度:《与孙琴西方伯书》,见《天岳山馆文钞》卷三十六,清光绪六年爽溪精舍刻本。

②周礼昌撰:《诰授光禄大夫内閣学士兼礼部侍郎銜周公荇农府君行状》,见缪荃孙纂录《续碑传集》卷八十,江楚编译书局刊校本。

③王先谦:《诗余偶钞六家序》,见《诗余偶钞六家》卷首,清光绪十六年刻本。

④《曾国藩全集·书信之十》,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4页。

⑤庄玉波:《北岳山房遗书跋》,见《北岳遗书》卷末,民国铅印本。

⑥吴恭亨:《北岳山房遗书序》,见《北岳遗书》卷首,民国铅印本。

⑦杨彝珍:《祭朱晴笙文》,见《移芝室全集·文集》卷十,清光绪二十二年孙世猷刻本。

吴敏树守制三年后,于训导任上称病辞官。之后倡办巴陵团练,又辗转湖南各地,终未再度入仕。吴敏树在湖南诗名甚著,自号枏湖老人,以期通过创立枏湖派来摆脱桐城派阵营。这虽与吴敏树早期不立宗派的态度相悖,但也体现了他意图争夺文学权力、冲破桐城局囿的真实动机。但正是在这种文学宗派观念的离合中,客观上完成了吴敏树私授门徒以传衍桐城诗派的任务。而发现和培育杜贵墀正是这一过程的重要成果。巴陵杜贵墀是吴敏树同年杜焯之子,吴敏树见其年少失怙,便多有提携指点。吴敏树曾称赞其“仲丹天下士,齐擘必推大”^①。除了诗文学习上的指导外,吴敏树还多次向左宗棠、曾国藩等友人推荐杜贵墀。《桐城文学渊源考》论述吴敏树时说:“惟杜贵墀最得其传。”^②

同治二年(1863),周寿昌经周寿祺介绍,认识了同乡后学湖南善化王先谦。于是周王由此定交,并开始了二十多年的师徒之谊。王先谦对周寿昌倾慕已久,虽然分隔两地,但也经常书信问学。王先谦就曾这样描述他们的师徒问学的情况:“郑重传衣钵,丁寧共槩铅。”^③周寿昌谢世后,王先谦还作诗怀念恩师的教诲:“永念杏坛丈,含悲述长歌。”^④王先谦由周寿昌引入桐城门庭,是其学术与创作的重要关捩。之后,王先谦才逐渐由周寿昌而直接上溯姚鼐,并自觉以继续桐城之学为己任。

孙鼎臣到湖南之后,致力学术。咸丰四年(1854)主讲湖南衡阳石鼓书院,但时间很短。从其所作《书院示诸子》大致可以看出其讲学宗旨。他勉励诸生要在乱世之中敦品励学,捍卫圣贤之道,这也正与桐城诗派的为学精神是一致的。后不久就隐居苍茆谷,咸丰九年(1859)就溘然长逝了。其在《复薛晓帆书》中说:“丧乱以来,良师友各在一方……故以文相从。”^⑤或许,这正是描述了太平军兴之下湖南诗人普遍的真实状态。

(二) 同声相应

由都下雅集而开始的交游活动,随着湖南士人的南归,在湖湘大地上得到了有效的延续。饱

受乱离的湖南诗人们在文学交游中酬唱赠答、相互慰藉,无论形式和规模都较之前有了极大的拓展。共同的文学品性是其不可或缺的交流基础。通过形式多样的诗学交流,进一步推进了湖南桐城诗派的群体认同。

湖南文人雅集所呈现的桐城诗派传衍的效果相对隐蔽,或许无法从具体雅集交往中获得明确的传衍信息,但是这种雅集所带来的文学上的影响是深刻的,它从创作交流的角度为湖南诗人趋向和接受桐城提供了一种方向。如同治十一年三月(1872)的长沙“絮园雅集”,参与的湖南诗人有吴敏树、郭嵩焘、郭意城、何应祺、李元度、罗研生等。同治十三年十月(1874)的“曾祠雅集”,参与的湖南诗人有杨彝珍、郭嵩焘、曾国荃、李元度等。湘人雅集既叙乡谊,也会在这样的情感基础上去寻找诗学上的群体认同。而这些认同正是他们诗学理念的最大共识。再加之当下的诗学风气、群体崇尚以及前期已有的传衍基础,可以说他们的群体认同就是在若隐若现的桐城诗法的影响下进行的。故而,湘人雅集就自然具有了传衍桐城诗派的特性和价值。除此之外,酬赠唱和、互寄诗作也是创作交流的重要一端。如周寿昌《酬赠曾涤生侍读国藩大雨见怀场屋原韵即柬郭筠仙孝廉》、刘蓉《赠李次青司马用吴子序编修韵》等等。

通过书信讨论诗法,更是有效的桐城诗法传衍途径。而这种讨论因为基于趋同的身份特点又往往建立在共同的诗学崇尚之上,因此容易达成某种诗学共识。由于认同而进行对话,进而发现共识,这本质上就是一种桐城诗学的传衍理路。杨彝珍《致吴南屏》:“至论作诗之旨,尤与不佞不谋而合。”^⑥曾国藩《复吴敏树》中说:“见示诗文诸作……鄙见约略相同。”^⑦

批点定诗行为的发生,根本原因在于对对方文学成就的敬佩以及自身学习诗法的迫切渴望。而在这兼具权威与信任的情感基础之上,深受桐城诗法影响的诗坛前辈们或创作楷模们便纷纷传法施教。作为一种最为强烈的诗学互动和创作对

①吴敏树:《次韵仲丹用柬伯乔韵寄怀之作》,见《钓者风》卷一,清同治八年刻本。

②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徐天祥校点,黄山书社2018年版,第51页。

③王先谦:《自庵丈喜予到京有作次韵》,见《虚受堂诗存》卷五,清光绪二十八年平江苏氏刻本。

④王先谦:《自庵先生灵柩南归送至通州赋挽词一章次李菀客韵》,见《虚受堂诗存》卷十一,清光绪二十八年平江苏氏刻本。

⑤孙鼎臣:《复薛晓帆书》,见《苍茆文初集》卷十三,清咸丰刻本。

⑥杨彝珍:《致吴南屏》,见《移芝室全集·文集》卷十二下,清光绪二十二年孙世猷刻本。

⑦《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31页。

话,批点定诗在湖南桐城诗派诗人中已然形成风气。杨彝珍就曾请求吴敏树为其定改诗文,《致吴南屏》:“兹寄上二部,望有以涂乙而改削之。”^①吴敏树在《芝房旧赠诗联书后序》叙述了他为孙鼎臣定诗:“芝房尝委余定其诗……芝房不以为妄,尽如所论。”^②曾国藩也曾请吴敏树教正诗作:“去岁及兹作得十余首……兹抄五六首奉承教正。”^③

(三)幕府论诗

早在道光十五年(1835),曾国藩就已入都。后道光十八年(1838)至咸丰二年(1852)一直在京任职。在都期间,曾国藩虽与梅曾亮也多有交游,但其在咸丰九年六月(1859)《柏枧山房文集跋》中说:“余官京师,与梅君过从,凡四年,未得毕读其集,今始细读一过耳。”^④在咸丰九年十二月初二日《复吴敏树》中又说:“往在京师,雅不欲混入梅郎中之后尘。”^⑤由此态度,不难看出曾国藩不愿与梅曾亮为伍。同年,曾国藩在《圣哲画像记》中说:“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⑥因此,曾国藩当是以私淑姚鼐而入桐城门庭。

从咸丰八年十二月(1858)至咸丰九年正月(1859),曾国藩相继完成了《欧阳生文集序》和《圣哲画像记》两篇文章。《欧阳生文集序》集中体现了曾国藩对于桐城派流衍全国的基本看法,而《圣哲画像记》则表现了曾国藩服膺桐城姚鼐的真实心理。另外,检阅这一段时间曾氏日记可以发现,这期间其主要阅读了《惜抱轩集》《梅伯言文集》《彭昱尧子穆文集》《古文辞类纂》等桐城派著作。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阅读习惯与偏好还一直为曾国藩一生所坚持。根据粗略统计,姚鼐和梅曾亮的别集以及《古文辞类纂》是其日记所

叙述的阅读书目中频率最高的。从这些信息中大致可以窥探到他有着极为强烈的存续宗派的自觉意识和中兴诗派的责任观念。

曾国藩幕府是桐城诗派传衍湖南的一个极为独特的空间和系统。曾幕既是戎幕也是学幕。幕主与宾客的论诗酬唱,再加之幕主尊尚桐城的导引,使得曾幕成为湖南桐城诗派传衍的重要平台。从曾幕走出的湖南籍桐城诗派诗人就有何应祺、刘蓉、李元度、郭嵩焘等等。何应祺说:“祺侍曾公左右者有年,所以期望者甚厚。”^⑦刘蓉也曾作诗:“幕府三年共短檠,一床风雨慰孤情。”^⑧两人都深情地表达了他们受教于幕主曾国藩的感激和怀念。

幕府论诗是曾国藩幕府学习交流诗法进而传衍桐城诗派的重要方式。曾国藩的日记中对其与宾客论诗有着颇多记录,如咸丰九年正月初四(1859):“与次青、仙屏论诗。”^⑨咸丰九年二月初一(1859):“中饭后,邓弥之来,与诸君论诗。”^⑩咸丰九年二月初二(1859):“圈子序、次青、仙屏三人诗,批之。”^⑪咸丰九年二月二十五日(1859):“夜与次青、仙屏等观邓弥之、吴竹庄和诗。”^⑫不仅如此,作为幕主的曾国藩还对宾客的诗作进行评点,以此相互磨砺。曾国藩就曾指点刘蓉诗歌创作:“承示诗歌诸篇……风骨迥逸,绝无衰老艰涩之态。东坡谓陈氏精悍见于眉间,岂山中之人哉。”^⑬与作为主导的幕主的诗法交流,其本质是一种诗学观念的传播。一众幕僚折服其功业与文学,加之风气所及,所以也都趋归桐城。刘蓉就曾说:“桐城义法非无据,要在天机入妙时。”^⑭应该是深刻地体现了曾幕宾客崇尚桐城义法的真实心理。

幕府的唱和联吟为桐城诗派在湖南士人中的

①杨彝珍:《致吴南屏》,见《移芝室全集·文集》卷十二上,清光绪二十二年孙世猷刻本。

②吴敏树:《芝房旧赠诗联书后序》,见《梓湖诗录》卷四,清同治八年刻本。

③《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31页。

④曾国藩:《柏枧山房文集跋》,见《柏枧山房诗文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696页。

⑤《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30页。

⑥《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53页。

⑦何应祺:《刑部右侍郎顺天学政贺云甫先生六十寿言》,见《守默斋杂著》(不分卷),清同治十年善化何氏刻本。

⑧刘蓉:《曾太傅挽歌百首》,见《养晦堂诗集》卷二,清光绪三年思贤讲舍刻本。

⑨《曾国藩全集·日记之一》,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99页。

⑩《曾国藩全集·日记之一》,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05页。

⑪《曾国藩全集·日记之一》,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06页。

⑫《曾国藩全集·日记之一》,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13页。

⑬《曾国藩全集·书信之八》,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88页。

⑭刘蓉:《曾太傅挽歌百首》,见《养晦堂诗集》卷二,清光绪三年思贤讲舍刻本。

传播提供了群体基础和传衍条件。曾国藩在给刘蓉的信中说:“军中多暇,间有朋游文诵之乐。何廉昉作《除夕感怀诗》十六首,仆偶次韵和之。一时叠唱至三十余人。”^①在给何栻的信中也说:“顷与子序、震轩、次青、少荃、仙屏诸君宴集其上……诸君即事奉和,用其体而不次其韵。”^②在其日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述。如咸丰九年正月二十九日(1859)日记:“未刻,作七律五首,和何廉昉诗,次韵。同和者为李次青、甘子大,许仙屏等数人。而王霞轩、邓弥之,何镜海等亦将和之。”^③在这些唱和中,既有依韵的,也有和诗的,还有仿体唱和的,形式极为丰富。另外,在这些唱和活动中,既有桐城诗派的代表吴嘉宾,也有李元度、何应祺等湖南籍诗人。这些趋同的身份信息和多样的唱和方式,也足以看出幕府唱和在桐城诗派传衍湖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必须提到的是,咸丰四年(1854)的“会合联吟”和同治七年(1868)的“筵邨唱和”是曾国藩幕府最大的两次唱和活动。这两次在清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唱和活动,不仅体现了曾国藩幕府唱和的规模之宏大和影响之深远,同时也体现了曾国藩主持诗教、弘扬桐城、天下翕然宗之的领袖魅力。而桐城诗法也正是在这样的契机中,随着曾国藩的引入和弘扬,被幕府中的湖南士人所接纳。

刘蓉、郭嵩焘、李元度等是从曾国藩幕府里成长起来的诗人,深受曾氏和桐城诗学的影响。刘蓉咸丰五年(1855)离幕,但一直与曾国藩保持书信来往,其中交流诗文学术甚多,一生恪守程朱理学。同治五年(1866),郭嵩焘请辞回湖南之后,善化瞿鸿禛曾从其问学。余肇康对其师徒交游有这样的描述:“文学多所点定,屡冠其曹,自谓得力最多。”^④可见问学之诚。李元度服膺曾国藩的为人与学问,受其影响颇大。即使交恶之后,也依然以师相称。不仅如此,李元度还与杨彝珍交情甚笃,亦师亦友,多有诗文切磋交流。杨彝珍曾坦言:“念自设教以来,其心悦诚服者,惟次青与

君耳。”^⑤

曾国藩一生戎马倥偬。因此,曾氏自然将幕府讨论学习的经验延伸到了家学教育中。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1858),他在家书中指示曾纪泽作诗门径:“作诗,最宜讲究声调。”^⑥同治元年正月十八日(1862),他指导曾纪泽作诗要不拘一格学习前人:“余所选十八家诗,凡十厚册。……尔要读古诗,汉魏六朝,取余所选曹、阮、陶、谢、鲍、谢六家。”^⑦不仅如此,他还为曾纪泽批点诗作。如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九日(1863):“改纪泽古文一首,四言诗一首,五七言诗三首。”^⑧这些讲求声调、学古不拘一格、注重模仿等都是桐城诗学的重要观念。在这看似不谋而合的家族文学教育中,其实是一种自觉的桐城诗学的推扬。

咸同年间,面对邦国巨变,湖南桐城诗人们回湘传法,开拓诗境,顺利地完成了对桐城诗派文学上的反哺。这一过程直接导致了以曾国藩为核心的桐城诗派湖南传衍群体的形成,并由此推动了桐城诗派文学权力的交替。曾国藩以其事功和文学,在咸同时期终于主掌了桐城诗派文柄。以曾国藩为核心的桐城诗人们在诗歌创作中经时济变,崇尚阳刚雄奇,一扫桐城颓势,最终实现了诗派的中兴。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卒于南京。同治十二年(1873),吴敏树卒于长沙。同年,刘蓉卒于湘乡。随着这些大纛旗手的相继谢世,湖南桐城诗派传衍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三 教导子弟,赓续绝业

清季以来,邦国罹难。清廷危如累卵,桐城诗派更是不绝如缕。部分湖南籍桐城文人因仕途偃蹇,面对邦国变局,却也只能选择回乡储材造士,以另一种方式来完成担荷天下的使命。湖南桐城诗派的传衍,与书院教育和家学师承紧密融合,虽然拥有了更为深广的传承机制。但之后,随着新文学变革的逐渐深入,湖南桐城诗派也如其他古

①《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36页。

②《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43页。

③《曾国藩全集·日记之一》,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05页。

④余肇康撰:《清故诰授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瞿文慎公行状》,见闵尔昌纂录《碑传集补》卷二,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印本。

⑤杨彝珍:《致薛抚屏文》,见《移芝室全集·文集》卷十,清光绪二十二年孙世猷刻本。

⑥《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一》,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72页。

⑦《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页。

⑧《曾国藩全集·日记之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92页。

典文学流派一样慢慢走向了衰亡。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王先谦、郭嵩焘、阎镇珩、杜贵墀、颜昌峣等。

(一)垂教乡邦庠序

书院具有教学、藏书和祭祀等功能,是一个培育人才、弘扬师法、聚揽同道的重要空间。桐城诗学的教育与试帖诗的教学在理论上具有诸多相通之处。不仅如此,书院教育以山长主讲、学生自学的形式为主,因此主讲书院讲席的个人崇尚对整个书院的文学风气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这些主讲书院的桐城诗人又都是湘中耆宿,因此追随者甚众。所以书院教育成了桐城诗派传衍的重要空间,这种空间打破了地域、血缘、时间等的限制。

有清一代,真正开始鼓励兴办书院是在雍正年间。雍正十一年正月(1733)上谕:“朕临御以来,时时以教育为念。……则建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运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①郭嵩焘面对经世人才的湮没,曾在《致沈幼丹制军》中慨叹:“而自秦汉以来,学校之不修二千余年,流及败坏以至今日。”^②因此,他极力主张书院教育要“求为征实致用之学”^③。同治九年四月(1870),郭嵩焘开始主讲长沙城南书院。书院讲学期间,郭嵩焘大力提倡经世思想,培养时务人才,但时间不长。光绪七年三月(1881),他又一次回到湖南后,在长沙曾国藩祠堂内,开设校经堂。为了弘扬桐城先贤曾国藩的思想学问,特意将校经堂命名为思贤讲舍。同时,他还为讲舍订立了学规,其中就有:“自重以为立身之本,讲求礼法以为接人应务之方……读书务实以立为学之程。”^④无论从城南书院还是从思贤讲舍的讲学宗旨来看,经世济变都是其基本精神。而这也正与湖南桐城诗派“与世变相因”的经世特点深度契合。在郭嵩焘主讲书院的生徒中较为知名的有长沙张百熙。

王先谦由周寿昌而上溯姚鼐,并决意赅续桐城。他说:“本朝纠正汉学者,姚氏最为平允。”^⑤其门人苏舆就曾说:“吾师葵园祭酒,曩曾赅续桐城。”^⑥而陈毅也在其《虚受堂文集序》中称其“一以姚氏宗旨为归,而进求合乎先儒义理之学”^⑦。集中体现王先谦私淑姚鼐,并自觉传承桐城文脉的是其光绪八年(1882)编纂成书的《续古文辞类纂》。王先谦曾在《续古文辞类纂序》坦言:“惜抱自守孤芳,以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一缺。梅郎中曾文正之伦相与修道立教,惜抱遗绪,赖以不坠。……余辄师其意,推求义法渊源。”^⑧

光绪十六年(1890),王先谦卸任回湘,郭嵩焘就此让出思贤讲舍的主讲之席。光绪十七年(1891),王先谦出任城南书院山长。光绪二十年(1894),王又任岳麓书院山长,并长达十年。他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院长手谕这样写道:“方今时事多艰,培才为急。将欲讲求实用,不能专制艺试帖以为选就之资。”^⑨可见,崇尚经世,讲求实用,是王先谦讲学的重要宗旨。在王先谦主讲书院的生徒中,有湖南桐城一脉的最后传人颜昌峣,还有经王先谦揄扬而名满天下的湘乡王龙文。

光绪十二年(1886),杜贵墀任长沙校经书院山长。杜贵墀执掌讲席前后近十五年,培养人才甚众。平江苏舆、湘潭刘肇隅、益阳曹佐熙都师事杜贵墀。刘凤苞光绪十七年(1891)主讲常德郎江书院,光绪二十年(1894)又任城南书院山长。其在城南书院的生徒中有名的就有长沙李肖聃。光绪二十五年(1899),阎镇珩捐私田兴建北岳精舍。光绪二十八年(1902),阎镇珩任石门书院山长。后不久,又在慈利渔浦书院任讲席。时有“著书千卷,弟子盈万”^⑩之称。

书院教育与桐城诗派传衍的联系是极为丰富而隐蔽的。诗赋教育本身就是书院教育的重要内容。经主讲陶淑濡染,生徒弟子的风气与崇尚也

①《世宗宪皇帝圣训》,雍正十一年正月壬辰,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3页。

②郭嵩焘:《致沈幼丹制军》,见《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一,清光绪十八年刻本。

③郭嵩焘:《致沈幼丹制军》,见《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一,清光绪十八年刻本。

④《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7页。

⑤王先谦:《复阎季蓉书》,见《虚受堂文集》卷十四,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⑥苏舆:《虚受堂文集序》,见《虚受堂文集》卷首,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⑦陈毅:《虚受堂文集序》,见《虚受堂文集》卷首,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⑧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见《虚受堂文集》卷三,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⑨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5页。

⑩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人物志》,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525页。

因此发生悄然改变。清季湖湘书院所极力弘扬的讲求义理经济等的观念,恰是湖南桐城诗派诗人的诗学创获和为学旨归。书院教育是湖南桐城诗派回应时代的必要策略,进而使得诗学理论和诗派传衍在乱世中纷纭激荡。湖南桐城诗派此时也正是通过对现实的观照与反思,延续着桐城诗派的最后命脉。

(二)世其师道家学

作为进入师门的生徒,许多人还有着弘扬师道的强烈责任感。由于桐城诗学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师法的意味,因此保存传播师道文献,是诗派传衍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王先谦和同门瞿鸿禛广泛收罗,捐资刊刻其师周寿昌的著作。他曾在光绪十四年(1888)刊刻的周寿昌《思益堂集序》中深情阐述其弘扬师道的初衷:“虑先生撰著,日就湮失。访诸其家,得诗文词日札共若干卷。亟与瞿子玖学士谋共捐资刻之。”^①

宣统三年(1911),杜贵墀门人曹佐熙作《怀巴陵杜先生》:“梓湖遗绪先生续,桐阁丛书弟子传。”^②可见其门人追思先师、弘扬师道的笃定信念。由吴敏树到杜贵墀,再到曹佐熙,这是师门的统续,也是宗派的统续。弟子对师道的自觉弘扬,为诗派的传衍提供了保证,是文学历时发展的必要因素。

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除了维系家族的繁衍,同样有着传承家学家风的文化功能。从大处说,文化启蒙、学问导引和道德教育是家学的主要内容;从细处说,诗古文辞和科举课业也在家学的教育中被强调和关注。从宏观来看,家族的文化精神、道德原则、处世策略在家学传承中得以延续弘扬;从微观来看,长辈的学问门径、文学经验和审美观念也会在儿孙的教育中得以继承光大。正是由于这样的文化传统,中国古代文学世家频繁出现。桐城诗派最早是一个地域文学流派,在其传衍中,家学传承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并且,作为一种基于血缘的文化传承,家学传衍对推进壮大诗派门户的作用要更为牢靠。

杨琪光、杨球光师事其父杨彝珍,世其家学,笃志于诗古文辞。在湖南桐城诗派的诗人中,出现了许多父子兄弟同派的情况。如吴敏树、吴庭

树和吴镜蓉,郭嵩焘、郭刚基和郭庆藩等等。曾国藩将桐城诗学融入家学教育,深刻地影响了曾纪泽。在光绪十九年所刻的《曾慧敏公诗集》中,曾纪泽还把其父曾国藩的批点刻入别集。

光绪十七年(1891),郭嵩焘在长沙病逝。光绪二十七年(1901),杜贵墀卒于长沙。光绪三十一年(1905),刘凤苞病逝。宣统二年(1910),阎镇珩卒于石门。1917年,王先谦卒于长沙。作为桐城诗派传衍湖南的最后阶段,已然没有了往时浩荡的声势了。由于社会动荡、新文学变革的冲击等,湖南桐城诗派的末代传人们也缺乏极为出色的创作实绩。1930年,颜昌峤出版其诗古文别集《珍涟山馆文集》时,时人善化罗庶丹认为这已是“湘中绝业”。而长沙李肖聃则在其序言中虽然肯定了颜昌峤的诗文,但面对日暮西山的湖南桐城诗派也只能痛心慨叹:“自光绪季世,异学争鸣,诡辞伪体,狂惑一世。诸老辈尽死,后生不闻体要,湖南之文,因以益敝。”^③文学革命,时势所趋。湖南桐城诗派正是在新文学的贬抑众声中黯然消亡。

余论

从姚范谈艺极深的《援鹑堂笔记》,再到方东树系统论诗的《昭昧詹言》,桐城诗派基本完成了桐城诗法理论谱系的建构。诸多诗学观念也在几代桐城诗人的丰富与创新中得到完善与拓展。要言之,则是:在艺术特色上以文为诗,在思想内容上尊崇义理,在形式表现上注重声音,在师法渊源上熔铸唐宋,在学术立场上汉宋兼采,在审美追求上雅正不俗。

变而后大。湖南桐城诗派在邦国危亡、宗派难继之下,崛起于咸同年间。湖南桐城派诗人们在对既有诗法的深刻反思和社会现实的关注批评中,努力创新桐城诗法,极大地拓展了桐城堂庑。以曾国藩为核心的湖南桐城诗人群体以其事功和文学最终出色地实现了桐城诗派的中兴。在比较中考察其诗学创获,可从以下几点作简单申说:

其一,“义理之学最大”^④。嘉道以来,汉学流弊甚重,于帝国的现实危机无所裨益。理学在现

^①王先谦:《思益堂集序》,见《虚受堂文集》卷五,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②曹佐熙:《怀巴陵杜先生》,见《岭南诗草》卷一,民国抄本。

^③李肖聃:《李肖聃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51页。

^④《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一》,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9页。

实的需要中,悄然复兴。湖南桐城诗人具有理学经世派和帝国官僚的多重身份。他们以期通过重申程朱义理之学来整饬学风、收拾人心。尊崇义理已然成为湖南桐城诗人为政、为学和为文的根本理念。曾国藩极力强调义理为本、名物为末,认为义理就是最核心的内容和精神。其在诗学上提出“积理”的基本看法,并由此大力地丰富了“理”的诗学内涵。

其二,“与世变相因”^①。湖南向来具有深厚的理学经世传统,湖南理学经世派士人群体更是在嘉道之后成长为一支重要的政治文化力量。曾国藩在姚鼐提出的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学问之途外增加经济一门。辅世翼教、磨世励钝成为杨彝珍等湖南桐城诗人普遍的诗学宗旨。正因如此,湖南桐城诗派与朱琦等广西桐城诗派诗人“诗史”式的创作不同,对现实政治的热情参与,对民瘼吏蠹的忧愤批判,对学术世道的深刻反思成为他们共同的主题。

其三,“论诗亦取傲兀不群者”^②。雄奇兀傲是曾国藩作诗论诗之职志,同时也是他对桐城诗学审美风格的最有力的拓展。曾国藩从对昌黎和山谷的学习中,领悟到愈拗愈深的诗学意味。他将这种诗学追求贯通于诗文,并从内容和形式等多角度进行艺术塑造,以至雄奇不俗之境。姚鼐诗风雅正,但终归阴柔一路。其后论诗主阳刚雄奇,虽不乏其人,但从理论和实践都成功的,或只曾氏一人。这种对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的审美内涵拓展,极大地丰富了桐城诗学体系。使得桐城诗歌以刚健豪迈的面相在晚清诗坛走向中兴。

随着桐城诗派传衍湖南,湖南桐城诗人也在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上进行了颇富成效的探索。姚鼐之后,桐城诗派衰颓不振。最终,湖南桐城诗人在咸同年间促进了诗派中兴。他们的有益探索,足可表彰。桐城诗学里的湖湘气象,也成为这一百年古典文学流派最后历程里的夕阳晚唱。

On the Spreading of the School of Tongcheng Poetry in Hunan

WU Da-p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e spread of the School of Tongcheng Poetry in Huna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The first one was from the mid years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Daoguang to the early years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Xianfeng. Scholars in Hunan began to accept and pass on the Poetry School from Mei Zengliang in Beijing. Second, from the beginning years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Xianfeng to the final years during the reign of Tongzhi. Hunan poets returned to their hometown to spread the Tongcheng Poetry School, which promoted the group identity in making friends. At the same time, Zeng Guofan took over the literary handle of Tongcheng and presided over poetry teaching in high status. Third, from the early years during the reign of Guangxu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Scholars in Hunan promoted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ongcheng Poetry School through academy education and other means. Tongcheng poets in Hunan greatly expande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ongcheng Poetry School and promoted its resurgence. It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link for Tongcheng Poetry School to sprea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but also a key historical process in the history of Hunan local literature.

Key words: Tongcheng Poetry School; spread; Hunan

(责任校对 莫秀珍)

①《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05页。

②《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一》,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7页。